

调查记者的微博使用及其职业影响研究

吴 涛, 张志安

摘 要: 本文主要探讨微博使用对中国大陆调查记者生产实践及其职业意识的影响。包括: 调查记者的微博使用在“效率”层面对其新闻实践、在“观念”层面对其职业意识产生了哪些影响? 这些影响的背后, 哪些变化基于个体、组织或行业、社会情境的复杂因素而展开? 微博使用对调查记者生产实践和职业观念的影响, 对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新闻业的专业性、自主性和公共性会有产生哪些利弊? 研究发现: 调查记者在“常规”情境下, 最频繁使用的互联网功能是“使用搜索引擎来获得动态和背景资料”、“使用网络论坛寻找报道线索”、“使用 QQ 或 MSN 扩大人际圈”与“使用门户网站寻找报道线索”。比较而言, 使用微博进行新闻突破、社会动员乃至职业抗争等功能, 往往是“非常规”情境下为与权力管制进行博弈的行为。不过, “常规”情境下的效率优化是整体性的, 而“非常规”情境下的技术赋权则主要是基于个体的, 从结构的层面看, 微博使用并未实质上改变调查报道的自由和空间。

关键词: 调查记者; 微博; 生产常规; 专业主义

中图分类号: G21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5)04-0109-09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5.04.014

一、研究问题与文献回顾

自 2009 年微博兴起迄今, 用户规模已突破 3 亿人, 其中新闻从业者尤其调查记者是非常活跃的使用群体。与一般的新闻从业者相比, 调查记者的采访突破难度更大、报道空间更加逼仄、职业风险相对较高。作为新闻从业者活跃使用的社交媒体, 微博如何影响调查记者的生产实践、职业意识以及新闻自由度, 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 记者的微博使用及其职业影响

简要回顾以往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 学界对记者微博使用及其职业影响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记者微博的使用困境及其原因; 第二、微博使用对新闻生产和职业意识等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刘海龙从规范理论角度探讨新闻从业者微博使用的伦理和政策问题, 他指出: 新闻从业者微博使用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的冲突对立: (1) 鼓励使用 vs 限制使用; (2) 公民身份 vs 职业新闻工作者身份; (3) 个性表达 vs 专业表达; (4) 发表原创新闻 vs 转载所在媒体发布的新闻; (5) 公众利益优先 vs 媒体企业利益优先; (6) 透明化 vs 神秘化等。他认为, 有必要重新处理记者和组织的关系, 比如提升其新闻生产的披露式和参与式“透明性”^[1]。

纪莉、张盼则从媒介伦理的角度更具体地概括出微博使用造成的三种困境: (1) 微博的技术特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时期深度报道史 (1978—2008)” (09YJC860005); 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引进人才项目“新媒体环境下的中国新闻从业者” (17000-3281301)

作者简介: 吴涛,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 (广东 广州 510275); 张志安,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征是否有利于记者客观全面报道事实；(2) 记者在微博上发布信息的操作手法是否忽略了客观主义的报道方式；(3) 微博上的记者是否存在传播公权力滥用的行为。针对这些困境，作者建议加强记者对所属媒体的归属感，避免记者在其他平台传播信息时的伦理困惑^[2]。

哪些因素导致了记者微博使用的伦理困境？有学者指出：在记者微博上，记者的社会人角色中的“私”成分与媒介人角色代表的社会“公”权利是互相抵触的，而这是造成记者微博使用困境的重要原因^[3]。华进的研究则认为，记者微博使用困境的原因不仅在于公私双重身份背景造成的角色定位模糊，还包括碎片化传播背景下受众对信息的误用与误读、微博作为一种叙事媒介的“无意识”助推，因而，是这三种原因的合力造成了微博的使用困境^[4]。刘海龙则对上述观点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记者微博使用中出现的困境不是由微博等社交媒体所带来的，微博只不过放大了新闻观念中的一些根本矛盾^[1]。鉴于记者微博使用的困境，有学者对中国大陆媒体、路透社、美联社社交媒体使用规范进行了比较研究，对规范记者的微博使用行为有一定参考价值^[5]。

尽管存在伦理困境，但学者们总体上认为，媒体应该鼓励记者使用微博，但也必须建立一些内部规范。如张志安建议：鼓励记者实名开设微博，给予充分的表达空间，但要在机构内部备案、并以观点表达为主、不能提前刊发未刊载的新闻等^[6]。一些市场化媒体甚至在内部微博使用条例中，向记者介绍如何绕过微博审查、网络过滤，不仅如此，“当记者在微博上采取有‘越界’嫌疑的行动时，这些媒体往往不仅不公开反对，其官方微博和记者微博之间还更多呈现出前台‘相互呼应’、后台‘隐性合作’的场面”^[7]。

除了伦理困惑之外，记者的微博使用对其实践和观念产生了哪些影响？彭兰认为，记者微博作为专业媒体人走向社会化媒体的“转折点”具有多重意义，如与公民新闻的对接、认识和体验社会化媒体、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中“占位”，她将记者微博在新闻生产中扮演的多重功能概括为：新闻的直播平台、新闻线索的集结地、新闻的延展空间、网络评论的激发器、信息流向与流量的调节阀等^[8]。卞清则用从“职业新闻人”到“在线行动者”来概括记者使用微博的角色变化，她发现：活跃的记者微博使用者大多来自市场化媒体，其实践和话语带有较强的抗争性色彩，他们的微博行动既带有“职业抗争”的意味，也有带来成名的机会，总体上，微博使用帮助记者跨越了职业伦理的约束，从记录者变成了行动者^[7]。

不同于多数研究主要基于明星记者微博和与某些热点事件相关的记者微博的观察，王辰瑶则选择观察日常语境下记者的微博使用情况。研究发现：普通记者在微博上的能见度仍然相对有限，“在日常语境下，记者微博并未改变新闻生产者的话语权力结构，也没有产生与现有的新闻职业对抗的话语模式”^[9]。

(二) 调查记者的微博使用及其影响

与普通条线记者相比，调查记者尤其是在新闻圈中知名度较高、在微博上粉丝数较多的调查记者，会更加频繁、积极地利用微博来服务于自己的生产实践、声望建构、公共表达乃至社会动员。

笔者从新闻生产的动态过程考察了微博对调查性报道实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 调查性报道的消息来源正从筛选、疏离、线人报料转向定制、接近、主动求援；(2) 报道机制由记者主导、单次刊发转向公众参与、循环报道；(3) 行业互动从调查记者独立调查、业内沟通转向支援协作、公开动员。总体看来，调查性报道的新闻生产正在从组织化生产向社会化生产变迁^[10]。

在此基础上，笔者又从生产机制和报道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了微博使用对调查性的影响。从跟踪信源、设置议题、检索背景、循环报道、公民调查等环节看，微博的作用已经渗透在调查报道采写的全过程。此外，微博使用也对调查性报道的空间拓展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快速发稿、抢占先机；公众围观、产生压力；微博传播、边缘突破^[11]。

记者的微博使用不仅影响其调查性报道的生产过程，也会影响调查记者的职业意识。所谓记者的职业意识，李金铨将其定义为“记者对于媒介功能及记者角色的信念系统”^{[12](P48)}。张志安则认为它包括新闻从业者对自我角色、媒体功能、伦理道德、工作自主性和满意度等一系列问题的认知

和评价,是新闻从业者的观念体系和新闻价值观,也是影响乃至决定其新闻生产的内在因素^[13]。白红义在其研究中将记者的职业意识定义为记者对于媒介功能、职业角色及自我身份的认知与理解,认为其是长时期培养出来的一种价值系统,并内化成为记者日常新闻生产的一种指引。并指出对其进行研究的依据来自记者对于新闻、职业与自我的看法,以及记者在日常的新闻生产实践中的操作等方面^{[12](P49)}。

在过往微博使用对记者职业意识影响的研究中,卞清指出调查记者比一般记者更容易利用微博来提升个人知名度、建构职业威望。与现实中的默默无闻和高压不同,调查记者通过公共事件中的积极表现,获得了更多的粉丝和名望。这种“微博发言——粉丝剧增——一呼百应”的效应帮助调查记者跨越职业伦理的约束,从记录者转变成行动者^[7]。白红义认为,随着微博平台的出现,调查记者的职业角色将呈现出更加丰富的面向:一个可能的趋势是,倡导与中立两种角色会长期共存,二者相互缠绕,难分难解,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沌局面。不少调查记者在微博上体现出更强的倡导色彩,他们的行为方式变得十分激进,甚至自己成为新闻事件的主角,参与、介入、影响到新闻事件的发展进程^[14]。在白红义的另外一篇文章中,他选择纪许光微博反腐事件为个案,敏锐地察觉到当(前)调查记者成为新闻事件的主角,普通网民与职业从业者群体对纪许光评价的两极分化现象,已经从侧面提醒我们网络民意会对新闻专业权威造成冲击^[15]。笔者也在研究中指出,调查记者频繁使用微博的风险,如汹涌的微博民意可能影响记者的情绪判断甚至报道立场,公共事件的微博直播可能会制造调查记者的功利期待和成名想象^[11]。

基于上述文献的回顾和探讨,我们认为:一、作为研究对象,调查记者的微博使用及其职业影响,尽管无法代表整体的新闻从业者,但具有“显性”样本的价值。由于调查记者是比较活跃的使用群体、在微博上知名度相对较高,因此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当作在微博上职业意识和生产实践活跃度最大化的“能动者”。二、作为研究问题,有必要从新闻生产的“常规”和“非常规”两种情境来探讨微博使用对调查记者生产实践、职业意识、新闻自由度、新闻职业化等方面的影响,以避免将公共事件中的微博影响与日常语境中的微博影响等同起来。本文以笔者2010年对全国调查记者所做的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近年来一些典型的调查记者使用微博的案例,采取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办法,探讨调查记者的微博使用对新闻生产实践及其职业意识的影响。

二、常规情境中的微博使用

对于记者微博使用情境的区分,可分为日常语境与热点事件情境,即微博使用的“常规”情境与“非常规”情境。在日常语境下,调查记者有一套处理每天工作任务的习惯方式即“新闻常规”,它包括寻找选题、联络信息来源、判断核实信息、采访、写作等部分。当下以微博为技术手段、工具,调查记者完成选题、联络信源、判断核实信息、采访、写作、发布等工作任务的习惯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一些新的新闻生产常规正在形成,它模式化的、重复的运用于调查记者每天的工作中。笔者将上述情况称之为微博使用的“常规”情境。

在“新闻常规”之外,在偶发性的热点事件中,个别的调查记者还利用微博与权力管控进行博弈,力图实现“边缘突破”,亦或利用微博以实现个人私欲,笔者将上述情况定义为微博使用的“非常规”情境。

针对“常规”情境下调查记者的微博使用情况的阐述,笔者以2010年对全国调查记者进行“总体普查”的相关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16]。

我们采用“请问你是否使用以下新媒体来帮助你的工作?”来测量调查记者新媒体使用行为(答案采取10级量表,1表示从来不使用、10表示频繁使用)。

表1 调查记者的新媒体使用行为

序号	新闻从业者新媒体使用各子项	均值	标准差
1	使用搜索引擎来获得动态和背景材料	8.45	1.85
2	使用网络论坛来寻找报道线索	7.20	2.29
3	使用QQ或MSN来寻求采访帮助	6.60	2.54
4	使用QQ或MSN来扩大人际圈	6.52	2.77
5	使用门户网站来寻找报道线索	6.51	2.53
6	使用博客或微博来寻找报道线索	6.01	2.68
7	使用QQ或MSN来寻找报道线索	5.27	2.59
8	使用博客或微博来扩大人际圈	5.06	2.98
9	翻墙浏览twitter等被禁网站的信息	4.71	5.85
10	在博客或微博转贴自己的报道	4.58	3.08
11	使用社交网站(如开心,校内)来扩大人际圈	3.52	2.74
12	使用社交网站(如开心,校内)来寻找新闻线索	3.37	2.33
13	在网络论坛中转贴自己的报道	2.59	2.18
14	通过翻墙发布与报道有关的信息	2.18	1.92

该题中涉及调查记者微博使用的主要有三小项:使用博客或微博来寻找报道线索($mean=6.01$)、使用博客或微博来扩大人际圈($mean=5.06$)、在博客或微博转贴自己的报道($mean=4.58$)。相对而言,调查记者使用微博更多的是用来寻找报道线索,其次是扩大自己的人际圈,最后是转贴自己的报道。可见,调查记者使用微博既有职业性的需求(寻找线索和转贴报道),也有个体性的社交需求(扩大人际圈)。

我们再来看下新闻杂志、市场化精英报纸、市场化都市报等三类不同性质媒体的调查记者使用微博的差异。

表2 三类媒体调查记者使用博客或微博来寻找报道线索情况

媒介性质	调查记者人数	均值	标准差
新闻杂志	60	6.37	2.89
市场化精英报纸	52	5.77	2.86
市场化都市报	146	5.95	2.53
总数	258	6.01	2.68

表2数据表明,在杂志工作的调查记者使用博客或微博来寻找报道线索频率最高($mean=6.37$),其次是市场化都市报($mean=5.95$),再次是市场化精英报纸($mean=5.77$)的调查记者。

表3 三类媒体调查记者使用博客或微博来扩大人际圈情况

媒介性质	调查记者人数	均值	标准差
新闻杂志	60	5.47	3.30
市场化精英报纸	52	5.56	2.92
市场化都市报	146	4.71	2.84
总数	258	5.06	2.98

表3数据说明,在市场化精英报纸工作的调查记者使用博客或微博来扩大人际圈的频率最高($mean=5.56$),其次是杂志调查记者($mean=5.47$),再次是市场化都市报的调查记者($mean=4.71$)。

表4 三类媒体调查记者使用博客或微博转贴自己的报道情况

媒介性质	调查记者人数	均值	标准差
杂志	60	4.65	3.45
市场化精英报纸	52	5.13	3.04
市场化都市报	146	4.35	2.94
总数	258	4.58	3.08

表4数据显示,在市场化精英报纸工作的调查记者使用微博或博客转贴自己报道的频率最高(mean=5.13),其次是杂志(mean=4.65),再次是市场化都市报(mean=4.34)的调查记者。

另外,本文还使用T检验对新闻杂志、市场化都市报和市场化都市报的上述三种微博使用行为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在使用微博寻找新闻线索上,三类媒体调查记者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使用微博扩大人际圈、转贴自己报道两项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相较于市场化都市报,在市场化精英报纸从业的调查记者更频繁的通过微博来扩大人际圈($t=1.8318$, $df=196$, $p<0.1$),在新闻杂志从业的调查记者也比在都市报工作的调查记者更多的通过微博来扩大人际圈($t=1.6521$, $df=204$, $p<0.1$)。

在使用微博转贴自己的报道上,杂志和市场化精英报纸两类调查记者没有显著差异。相比较而言,在市场化都市报工作的调查记者使用微博转贴自己报道的频率要弱于市场化精英报纸调查记者($t=-1.6419$, $df=196$, $p<0.1$)。

总结而言,不同性质媒体的调查记者在微博使用上既有相同的地方又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首先使用微博寻找新闻线索已经成为各类媒体调查记者完成日常工作的共识,差异性不显著,已然成为新的生产常规的一部分。杂志调查记者之所以使用微博来寻找新闻线索的频率要稍高于其他两类媒体调查记者,这可能与杂志出版周期长,报道选题相对静态化有关,而报纸的调查选题往往需要注意时效。其次市场化精英报纸的调查记者使用微博转贴自己的报道、扩大人际圈的频率要高于市场化都市报的调查记者,可能与他们更为看重报道的影响力以及个人的职业威望有关。

鉴于上述统计数据的不足(数据调查进行时间较早、涉及微博使用的题项有限),笔者还结合针对调查记者生产常规的长期跟踪观察,概括出一下新闻生产“常规”中的微博使用特征:

——生产主体:从记者主导到“记者+爆料人+公民”的多元参与。传统的调查性报道生产的主体是由新闻组织机构雇佣的职业的调查记者,而在“人人皆是记者”互联网时代,个人利用微博进行爆料,这些爆料被广泛转载后比较容易成为媒体调查性报道的选题,公民个人甚至参与到调查性报道的生产过程中,成为生产主体的一部分。

——消息来源:从线人爆料到主动求援、数据挖掘。原先调查记者的消息来源主要被动地来自于线人爆料,而当下记者可以使用微博在网上发布求助信息主动求援,甚至一些调查性报道的选题可以基于数据挖掘的结果而获得线索。不过,主动求援的情况,通常只适用于报道题材非独家的情况。

——背景检索:从海量查找到性格、行踪及社会关系网分析。过去调查性报道生产过程中的一大难点,就是相关人物的背景检索,调查记者经常容易淹没在海量的信息中费时费力。现在,如果被调查对象有实名微博或者匿名使用微博,调查记者可以分析其微博关注、粉丝、相册、足迹等信息。根据微博内容分析其性格,从“相册、足迹”中一窥其行踪,从其关注的名单中辨析其社会关系网,这对把握报道对象的性格、观念乃至生活节奏都提供了有效的新途径。

——报道机制:从单次刊发完整呈现到循环报道、快深结合。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性媒体的兴起,正开始深刻改变着调查性报道的报道机制。“让调查性报道的生产体现出更多公众参与、由快到深的‘循环’特征,即有学者概括的‘碎片化或滚动式’趋势。促使新闻报道尤其调查报道的生产由记者主导、组织把关变成公众参与、协同传播,由一次刊发、单次传播变成接力赛跑、循环报道。”^{[6](P95)}

——生产过程：从封闭、后台化到协同、透明和前台化。传统调查性报道的生产过程通常是不透明的，在组织内部进行，新闻生产也被置于编辑部的后台，很少有机会为公众所见。但在互联网语境下，通过微博平台，调查记者可以向公众解释说明新闻线索的发现、与信源的联系、阶段性成果的发布、把关控制过程。新闻生产“可视化”，受众不但可以了解新闻生产的过程，甚至参与互动^[17]。

——行业互动：从业内沟通、业务探讨到公开对话、行业批评。调查记者是微博使用的活跃人群，他们不仅在网络上频繁地接受和传播信息，也逐渐利用微博形成了频繁的交流、紧密互动的“虚拟共同体”。由此，让原本相对封闭的行业互动变成了公开的社会实践，调查记者经常在微博上进行公开对话和媒介批评，而且，经常会吸引普通网民参与其中。

——社会网络：采访建立关系到表达和互动中积累资本。过去，调查记者主要依靠采访建立社会关系网络，受到自身地理位置、采访机遇等因素的制约。而在当下，调查记者通过使用微博可以与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人士建立联系，在日常的表达与互动中积累关系资本、获取信任，拓宽自己社会关系网络，从而为日后的调查采访活动提供便利。一些调查记者活跃的微博表达，也会提高其职业声誉和社会影响，从而为采访过程中减少沟通掌握、增加彼此互信打下基础。

——报道影响：从所属平台刊载到社交媒体推广、公众讨论。在社交媒体兴起以前，调查记者发表的调查性报道偶尔会被同行媒体转载或者网站转发，从而扩大影响。现在，不少调查记者会使用微博来推广自己的报道，引发公众关注、引起同行讨论，从而扩大报道的影响范围。

总体上看，调查记者在“常规”情境下的微博使用，主要动机、行为和效果在于提高其新闻生产的效率、扩大其社会关系的网络和提升其新闻报道的影响。因此，使用微博已经成为绝大多数调查记者的常用技术工具。

众所周知，在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视野下，新闻从业者个人的认知与行为因素只是影响新闻生产实践的微观变量，因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调查记者在“常规”情境下的微博使用之所以能够提高新闻生产的效率，与宏观的社会技术语境与中观的组织环境密不可分。首先就宏观的社会技术语境而言，微博的出现与庞大的用户规模是调查记者能够提升新闻生产效率的重要条件，它们为新闻生产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源。尽管“新闻从业者更倾向于选择体制内的信息源，而不是普通人提供的信息”^{[18](P4)}，但当体制内的众多机构开设政务微博（还包括公务人员的个人微博），通过微博获取新闻线索、扩大人际圈拓展维护信息源也就成为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工作需要、工作手段。正如王辰瑶所言，网络在相当程度上被新闻从业者当作以传统模式获取配置性资源（最重要的配置性资源即信息源）的辅助手段^[19]。其次，正如上文所述，尽管记者微博使用存在一定的伦理困境，各大媒体组织在出台相应的规则规范旗下记者的微博使用行为，但在中国很多市场化媒体支持指导、记者使用微博，甚至出现组织与个人相互呼应、隐性合作的局面。

三、非常规情境中的微博使用

日常语境下的微博使用，并不足以完全反映调查记者微博使用的全貌，非常规情境下，一些调查记者会使用微博进行“边缘突破”或实现个人私欲。为探讨非常规情境下调查记者使用微博的案例，我们简要梳理了近年来的一些典型案例。

表5 “非常规”情境下调查记者微博使用的相关案例

时间	事件	概述
2010.7	仇子明微博求援	因报道凯恩股份关联交易内幕,遭到网上通缉。微博上出现“记者因报道定罪或遭全国通缉!”进行动员
2010.8	吉林桦甸记者被抓微博求援	《瞭望东方周刊》王立三和《南方周末》朝格图在调查吉林桦甸大河水库溃坝致30余人死亡事件,遭扣押、辱骂和搜身。邓飞编发微博,众多调查记者关注转发、声援
2010.9	女厕攻防微博直播	县领导机场拦截钟家姐妹,邓飞以“昌北机场直播”等标题在微博上实时直播,众多记者转发并赶往事发现场
2011.初	温州钱云会案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思璟直播温州钱云会案
2011年	杨海鹏微博救妻	《财经》杨海鹏妻子身陷经济案件,他在微博上抛出调查获得的内容,发布数百条微博。由于其调查名记身份获得广泛转发和同情
2011.5	武汉徐武事件	2011年5月《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思璟在微博上公布自己和其他记者在调查采访武汉徐武事件过程中收到来自官方的禁令
2012.11	雷政富不雅视频事件	朱瑞峰在人民监督网上报道了雷政富不雅视频,之后微博上引起围观;纪许光接力“表演”
2012.12	罗昌平微博实名举报刘铁男	在微博上“向中央纪委实名举报”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有作风问题,与商人倪日涛结成官商同盟等,引发广泛围观
2013.7	王文志微博两次实名举报宋林	《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实名举报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等高管在收购山西金业资产的百亿并购案中故意放水,致使数十亿元国有资产流失,宋林等已构成渎职,并有巨额贪腐之嫌。
2014.4	同上	再次举报宋林包养情妇,涉嫌贪腐

对上述非常规情境下调查记者微博使用案例进行分析,大体可以概括出三种情况:

1. 利用微博最大限度地公布事实、披露真相。这种情境下,微博扮演的是发表报道的特殊渠道。主要包括两种方式:其一、微博举报。如《财经》杂志罗昌平微博实名举报刘铁男、《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两次微博实名举报宋林。他们将职务作品通过非组织化的渠道进行发布,实现了新闻报道的“边缘突破”,造成社会围观的舆论压力,发挥了网络舆论监督的作用;其二、网络直播。如《凤凰周刊》记者邓飞直播“女厕攻防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思璟直播温州钱云会案等。调查记者以“公民记者”的身份,在非职务渠道上发布信息,以微博动态直播的方式披露真相,引发全民围观,继而通过激发舆论来倒逼真相。

2. 利用微博作为重要资源进行社会动员与职业抗争。主要分为两种方式:其一、个案式的社会动员,指向具体政府部门,目的在于声援同行、降低风险。如“吉林桦甸记者被抓微博求援”事件,调查记者在微博上发布记者被抓或挨打的信息,以集体施压的方式给当地政府施压,以保障同行记者的正当采访权。这种社会动员体现了调查记者群“同仇敌忾”的职业共同体特征。其二、整体性的职业抗争,指向行业监管部门和言论自由环境。如武汉徐武事件。不少调查记者会利用微博平台晒出宣传部门的禁令文本或翻拍照片,通过微博内容中“隐藏的脚本”隐晦地批判现有的宣传管制或者发泄对报道被禁令“枪毙”的不满情绪。

3. 利用微博实现个人目的,或建构职业威望或社会求助。主要包括两种情形:其一、自我表演,如“雷政富不雅视频事件”中调查记者的微博表现,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微博提升个人影响、赢得公众声援,以建构个体的职业权威。其二、自我救助,如“杨海鹏微博救妻事件”,其微博发帖的动机是为了营救妻子,虽借助于调查记者的身份实质上扩大了事件的影响力和关注度,但并未掺杂职业目的、亦无损于职业生态。

总体上看,第一、二种情况主要发挥微博的正面效应,以更灵活的方式、更自主的方式来报道事实真相、提升传播效果,有利于保护调查记者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推动调查性报道的行业发

展。这种有效利用微博在“非常规”情境下的报道突破,为调查报道争取到更大的报道空间和更多的社会资本。不过,需要厘清的问题是调查报道的组织特性和个体特性的关系、单位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一般来说,调查报道属于职务作品,选择非职务渠道进行发表可能会给组织带来不必要的管控风险,因此,如何平衡组织利益和公共利益在现实中存在矛盾和困境。

需要反思的是第三种情况中,利用微博进行自我“表演”、实现个人私利。在民粹主义盛行的网络舆论生态下,这种“表演”非常容易获得一部分公众的盲从^[15]。职业记者变身为表演者,得以“挟公众以令天下”占据话语霸权,混淆视听,破坏正常的调查性报道行业生态。

四、结语和探讨:微博使用及职业影响

依据上文分析,关于调查记者“常规”和“非常规”情境下的微博使用及其职业影响,可以做以下结论和探讨:

1. 针对调查记者个人而言:其职业角色体现出从“记录者+监督者”转向“记录者+爆料者+监督者”。在过往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调查记者在职业意识的媒介功能认知上更强调新闻的记录、阐释和监督功能^[16]。对于职业角色调查记者对于该扮演“记录者”还是“影响者”并无一致的看法,如果从专业或理想的角度,他们更强调“记录”,而从现实的国情出发则同样强调新闻推动社会进步的“影响”^[13]。这种职业角色认知的差异在调查记者的微博使用上也有所体现。在日常情境下,调查记者依然肩负起“记录者+监督者”的职业角色,微博只是作为新的技术手段,提高了调查记者的生产效率。

但在非常规情境下,由于长期在工作实践中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调查记者摆脱政治管控、组织制约的意愿非常强烈,这使得他们乐意而且积极的借助微博进行“边缘突破”,继而他们职业意识中对政治和其他权威保持怀疑的“对立者”角色愈发凸显出来。而在他们利用微博等社交媒体把一些在所属媒体平台上无法发布的信息和真相披露时,他们的职业角色上又多了一层爆料者的底色。他们不再只是记录者、监督者,还是爆料者,兼具职业记者和公民记者的双重身份。借助舆论的力量他们“影响”、推动着社会进步、行业自主。

2. 针对媒介组织的生产实践而言:首先,对调查记者的生产实践来说,常规情境下的“效率优化”甚于非常规的“技术赋权”,调查记者主要通过使用微博来提升寻找信息源、检索背景等环节的工作效率。在强有力的权力管控和组织规范下调查性报道生产过程中自我审查普遍化,“技术赋权”作用下使用微博进行新闻突破、社会动员乃至职业抗争只是非常规情境下的极少数的偶发事件。

其次,微博强化了调查报道生产的透明性(Transparency)和开放性(Openness)。不过,主要是披露式的透明性(Disclosure Transparency)——调查记者主动解释如何选择和生产新闻的过程,而非参与式的透明性(Participatory Transparency)——鼓励受众参与到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1]。

再次,微博使用也导致调查性报道的碎片化传播,使得一些焦点事件的传播过程中,调查性报道的机制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在短时间内,局部、碎片化的事实,通过爆炸式传播可能赢得公众的注意力,但却容易导致全面、完整的真相却无法抵达公众。而且,过度依赖微博传播,也可能导致调查报道生产的同质化。

3. 针对调查性报道行业的整体影响而言:首先,在社会动员层面上,调查记者的微博使用所营造的围观式“舆论监督”,有利于动员公众参与到舆论监督中,甚至参与调查报道的信息收集和内幕提供,使调查性报道行业呈现社会化、去专业化的态势。同时,由于在微博平台上普通公众可以参与到原先相对封闭的行业互动中,对调查性报道作品优劣发表批评意见等,新闻权威也容易“去权威化”;其次,在话语层面上,一方面少数名记者在微博上主导的悲情、戏谑、抗争式的话语,影响乃至形塑了普通大众对调查性报道行业的认知,另一方面以微博上盛行的民粹主义话语,也会对调查记者的政治倾向和报道立场产生影响。

诚如詹姆斯·柯兰等所言“社交媒体是个人解放的媒介,而不是集体解放的媒介;是自我表达的媒介(常常在消费者或个人意义上),而不是改变社会的媒介”^{[20](P206)}。在非正规情境下,少数调查记者可以利用微博与新闻监管进行博弈、扩大自由,既而实现技术赋权和职业抗争。但在正规情境中,调查记者的微博使用仅仅局限于效率提升,甚至还会有一些负面影响。总体上看,“正规”情境下的效率优化是整体性的,而“非正规”情境下的技术赋权则主要是基于个体的。从结构的层面看,微博使用并未实质上改变调查报道的自由和空间,也无法实现这个职业群体的集体解放。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方面的局限性,本文只能以2010年全国调查记者普查的部分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支撑,而对于非正规情境下,调查记者如何借助社交媒体进行“边缘突破”亦缺乏详细的田野观察材料。在后续研究中,笔者计划针对社交媒体与调查性报道行业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调查,并对调查记者微信使用进行在线观察和深度访谈,力求将调查记者社交媒体使用及其职业影响的相关研究推向深入。

参考文献

- [1] 刘海龙. 新闻工作者微博应用的困境及其根源[J]. 新闻记者, 2012, (9).
- [2] 纪莉, 张盼. 论记者在微博上的媒介使用行为及其新闻伦理争议[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2, (3).
- [3] 唐婵, 钱娜娜, 孙卫华. 记者微博: 私人化与专业化的冲突[J]. 中国报业, 2013, (20).
- [4] 华进. 媒介融合时代记者个人微博叙事的伦理困境[J]. 编辑之友, 2013, (4).
- [5] 白净. 新闻记者使用社交媒体规范探讨——中国大陆媒体、路透社、美联社规范比较研究[J]. 新闻记者, 2013, (3).
- [6] 张志安. 记者微博的价值和规范[J]. 中国记者, 2012, (5).
- [7] 卞清. 从“职业新闻人”到“在线行动者”: 记者微博的中国场景[J]. 现代传播, 2013, (12).
- [8] 彭兰. 记者微博: 专业媒体与社会化媒体的碰撞[J]. 江淮论坛, 2012, (2).
- [9] 王辰瑶. 日常语境下的记者微博研究[J]. 现代传播, 2013, (1).
- [10] 张志安. 新闻生产的变革: 从组织化向社会化[J]. 新闻记者, 2011, (2).
- [11] 张志安. 微博的兴起和调查性报道的变革[J]. 新闻实践, 2013, (3).
- [12] 白红义. 以新闻为业: 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意识研究[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
- [13] 张志安. 深度报道从业者的职业意识特征研究[J]. 现代传播, 2008, (5).
- [14] 白红义. 从倡导到中立: 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角色变迁[J]. 新闻记者, 2012, (2).
- [15] 白红义. 新闻范式的挑战与修补: 基于纪许光微博反腐事件的讨论[A]. 上海: 第一届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论文集[C]. 上海: 内部印刷, 2013.
- [16] 张志安. 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J]. 现代传播, 2011, (10).
- [17] 周葆华. 从「后台」到「前台」: 新媒体技术环境下新闻业的「可视化」[J]. 传播与社会学刊, 2013, (25).
- [18] [美] 盖伊·塔奇曼. 做新闻[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 [19] 王辰瑶. 结构性制约: 对网络时代日常新闻生产的考察[J]. 国际新闻界, 2010, (7).
- [20] 詹姆斯·柯兰, 娜塔莉·芬顿, 德斯·弗里德曼. 互联网的误读[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责任编辑 刘传红)

However, whether in Germany or in Taiwan region, the two-stage theory is widely questioned, and becomes an “excess load theorem”. In term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it should be characterized as public law contract but not private law contract, which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relative party and the third party, and implementing the legal supervision by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The latest revis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will lead the two-stage theory to the end in the legislation of mainland China.

Defense, Distortion and Return to Marxist Conception of Nature: An Exploration into Michael Löwy's Eco-socialism Theory SHEN Sen

Michael Löwy is an active and important scholar in the field of ecological socialism in contemporary Europe. Different from the North America Eco-socialism school's approach to study on Marxist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Löwy responds to ecological ecological view of marxism from a politic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to criticize capitalism, and he tries to describe the macroscopic picture and explore the ways to realize ecological socialism. His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m is not scientific, but still has important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for modernization progress in our country, especially in how to avoid falling into the “developplism” trap.

Can Stakeholders' Satisfaction Help to Ease Financing Constraints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Board Listed Companies? TANG Peng-cheng, YANG Shu-wang

In this paper, by the use of relevant data from 2008 to 2013 of China'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board listed companies of manufacture, both conflict resolution mechanism and management opportunism hypothesis are used to construct theoret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influence of stakeholders' satisfaction on financial constraints, together with the use of cash flow sensitivity of cash.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middle and small-sized enterprises' stakeholders' satisfaction is in the weak state; middle and small-sized enterprises are faced with serious financial constraints with more dependence on the internal financing; enterprises can increase stakeholders' satisfaction to ease the financing constraints, namely supporting the hypothesis of conflict resolution mechanism. When enterpris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sharing interests with stakeholders, both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principal-agent” problem can be solved to bring the convenience of exogenous financing.

Research on Influences of Microblog Use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WU Tao, ZHANG Zhi-an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s of microblog use on the production practice and professional consciousness of the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from Chinese mainland. The research questions are: what influences doe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microblog use have on their news practice at efficiency level and professional consciousness at concept level? Behind those influences, which changes are expanded based on such complex factors as individual, organization or industry, and social situations? What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will be brought to Chinese journalism's professionalism, autonomy and publicity under new media's environment by microblog us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under conventional situations, the internet functions that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use most are as followings: getting dynamic an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with search engine, looking for news clues with BBS, expanding interpersonal cycle with QQ and MSN, and looking for news clues with portal website.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tools, using microblog for news breakthrough,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vocational struggle is usually a way to game with the power regulation under unconventional situations. However, the efficiency optimization in conventional situations shows integrity, while the technical empowerment in unconventional situation is individual. From the structure aspect, microblog use doesn't essentially change the freedom and space of investigation and report.